

JOURNAL OF GUIZHOU HISTORY



贵州

龙志毅《发刊词》

毛泽东警卫谈毛泽东游泳

中国长寿之王

驰骋华北平原的骑兵团

一篇下落不明的绝密文章

道藩的三个心愿

王阳明“龙场悟道”

重走长征路诗选

文史天地

1994 · 创刊号

贵州文史天地创刊号

中国长寿之王

举世闻名的“中国长寿之王”，名叫龚来发，今年 146 岁，家住贵州省务川县茅天镇大帮村。你看他，神彩奕奕，耳聪目明，动作也还敏捷，长着一副 10 多公分长的白胡须，显得豁达而飘逸。

这位老人是仡佬族农民，自幼生长在空气清新的山寨中，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湿润。他半岁丧母，由一个姓向的人家收养，向家夫妇去世后流落深山，过了四年“野人”生活，习惯于赤足在山间行走，喝泉水，常年吃大米、包谷混合饭。因为从未出过远门，与外界少有接触，养成了清心寡欲、乐天知足的天性，从来没有什么怪癖。

他虽然没有结过婚，但向家已传了七代子孙，共 280 多人，现由家族中的第 5 代孙向道斌赡养，夫妻俩对他毕恭毕敬，就象是自己的亲“祖祖”。对家族中的许多人，老人还能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去年，全国老龄委员会和中国爱老行动委员会特授予龚来发“中国长寿之王”的称号。



《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顾问：

龙志毅 蹇先艾

王思明 蒋希文

编委主任：

蒋希文

编委：

王 瑛 冯 楠

史继忠 刘学洙

张 克 余宏模

罗信和 陈福桐

胡维汉 袁伯康

曹盛达 鲁 颂

社 长：

鲁 颂

主 编：

张 克

副主编：

史继忠 罗信和

美术编辑：

杜 宁

主办单位：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单位：《贵州文史天地》编辑部

地 址：贵阳市北京路 58 号

统一书号：CN52—1093/K

邮 编：550004

电 话：627582

定 价：2.00

几点希望和建议

——写在《贵州文史天地》创刊之时

● 龙志毅

《文史天地》即将问世，编辑部的同志要我说几句话。提起笔来却又颇费思量，说什么好呢？按照常规，无非是办刊宗旨，服务对象，办刊原则，所设专栏，最后是希望大家订阅、写稿，共同把刊物办好等等。这些话最好由编辑部自己来说，或者干脆登一篇启事什么的，也免挂一漏十。思之再三，我想还是就从《文史天地》这名称说起吧，当然是一管之见，仅供参考了。

《文史天地》四个字分开来剖析一下，这“文史”两字有点象平时写登记表中的姓名和性别。说明此刊物并非文学、美学、自然科学等专业刊物，而是文史类的综合刊物，而且是政协主办的。这就是这本刊物的规定性，“文史”是它的主要内容。至于“天地”，当然是借用自然的天和地而取其广阔之意，也就是广阔的领域。

既然如此，我想有几件事是要说清楚的。

一是有关“三亲”。我过去读过不少政协系统编写的“文史资料”，当然都是按照“三亲”的原则编写的。其中有不少很好的记实散文，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从不同的角度写出某一个历史事件，有很强的真实感和浓郁的感情成份，读起来引人入胜。使读者从这些叙事文中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因此，就“文史天地”来说，我认为今后还是需要提倡“三亲”，尽可能地多登一些“三亲”的文章。但时代毕竟是不同了，随着时光的流逝，能按照“三亲”的原则撰写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继续坚持“三亲”，首先稿源就成问题，而且会将刊物的内容搞得很窄，面貌搞得很死。只能成为资料积累而不能成为有生气的刊物。结论是：提倡“三亲”，但不局限于“三亲”，界限必须突破。

二是关于刊物的范围和内容。范围首先是这本《文史天地》的上下限。如果坚持“三亲”，上限不定自明，目前还能给刊物写文章的人，能写“五四”时期者已经屈指可数

了。“三亲”既可突破，便也用不着再定一个上限。要定，那就是上至远古，下至当代（包括建国以后），以当代为主。我认为这样来设计比较切合实际。其次是关于范围，文史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要在这“天地”两字上做文章，也就是说它的范围应当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乃至军事史等等，都是它研究和刊载的范围。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关于民族文史的问题。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它们是贵州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份。作为政协主管和主办的文史刊物，应当把各民族的文化历史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其三是在文史研究的内容上应当把史料、考古与人物的研究结合起来。当然，我们的刊物是综合性刊物，在研究内容和表现手法上都应当有别于专业性的文史科研刊物，要尽可能地照顾到更广泛的读者的兴趣和爱好。

三是关于以史为主兼顾其他的问题。文史刊物自然以史为主体，但既要“立足政协，面向社会”，而且还要“发行全国，走向海外”，其内容就不能单一在一个“史”字上作文章了。首先从“立足政协”来看，政协的组成非常广泛，包容了三十来个界别的各行各业，委员们的兴趣爱好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内容太单一的刊物，必然缺少吸引力。至于面向社会和走向海外更是不言而喻。为了使这本刊物尽可能地满足各方面读者的兴趣，应当在以史为主的前提下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诗词歌赋、旅游、风土人情、海外风情、乃至琴棋书画都可在本刊物上找到它一定的位置。借用一句话，它应当是“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刊物。

四是关于文体和风格。在办刊方案上对于文体是这么说的：“各种文体并存，生动活泼，努力办出特色”。在这几句话中，关键是“生动活泼”，板起面孔的文章往往使人见而生厌，即使内容很好，也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生动活泼的文章能引人入胜，使读者爱不释手。“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依然是一篇好文章的标准。像《文史天地》这样的刊物，除了少数论著之外，我认为应当提倡多用散文体。例如“三亲”的文章，用记实散文写出来就很有吸引力。至于旅游、风土人情等等则更可以用散文了。即使是专题论著或考古一类学术性、议论性很强的文章，也要在把握好鲜明性、准确性的原则下，尽可能地注意生动性，才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至于风格，方案上也有两句话：“保持高品位、高格调”。这是一个总体的要求。对这个要求曾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政协办的刊物，应当雅俗共赏。我认为雅俗共赏和这里所提的“二高”并不矛盾，所谓雅俗共赏的“俗”，决不是指的低级、庸俗的“俗”，而是通俗的“俗”。通俗的形式表达高品味的内容，同“生动活泼”是同义的。我们要把握的原则是通俗而不庸俗；生动而不荒谬；适应而不迎合。

怎样办好《文史天地》，编辑部已经拟就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办刊方案，前面所说的这些话，只能算是对“办刊方案”的一点注释，难免有片面的地方。办好一个刊物，除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办刊方针和方案，更要有一个精干的编辑部和一个能干的主编。就象一部交响乐，作曲家将乐章谱了出来，能否演奏得出色，就看指挥和乐手们如何一显身手了。

发刊词

几点希望和建议

龙志毅(2)

领袖风采

毛泽东警卫谈毛泽东游泳

柏灵讲述 尹昌中整理(6)

往事留连

驰骋华北平原的骑兵团

晓 珊(9)

怀念沙汀

蹇先艾(12)

史料珍闻

一篇下落不明的绝密文章

熊宗仁(14)

夏同龢的状元卷

陆辉南 杨真(20)

道藩的三个心愿

蒋碧微(23)

文史大师议蒋介石

高 山(19)

人物述林

王阳明“龙场悟道”

史继忠(27)

周钟瑄对开发台湾的贡献

朱崇寅(32)

任可澄生平一夕谈

彦 夫 整理(35)

文教春秋

张志韩与贵州教育

文 蒙(37)

记陈希文校长

李华年(39)

民族风情

仡佬族婚俗

琼 琴(41)

黔中山水

马别河峡谷风光

陈定秀(46)

海峡寄情

春风台南道

胡维汉(48)

热肠冷语

人言的份量

刘学洙(52)

贪者,民之贼也

龙圻成(53)

关于“贵族”的疑问

邝忠勤(54)

诗言史,诗言情

重走长征路诗选(十首)

陈 靖(55)

将军怀念将军

邕 公(11)

词四首

阎学增(31)

汉俳四首

徐 放(47)

读书一得

陈夔龙和他的《梦蕉亭杂记》

冯祖贻(58)

文史集萃

“夜折香花”枪手的覆灭

李修德(61)

奇闻趣事

黔人豢虎

一 泓(43)

名人轶事

一副挽联寄深情

黄万机(44)

海外记闻

访美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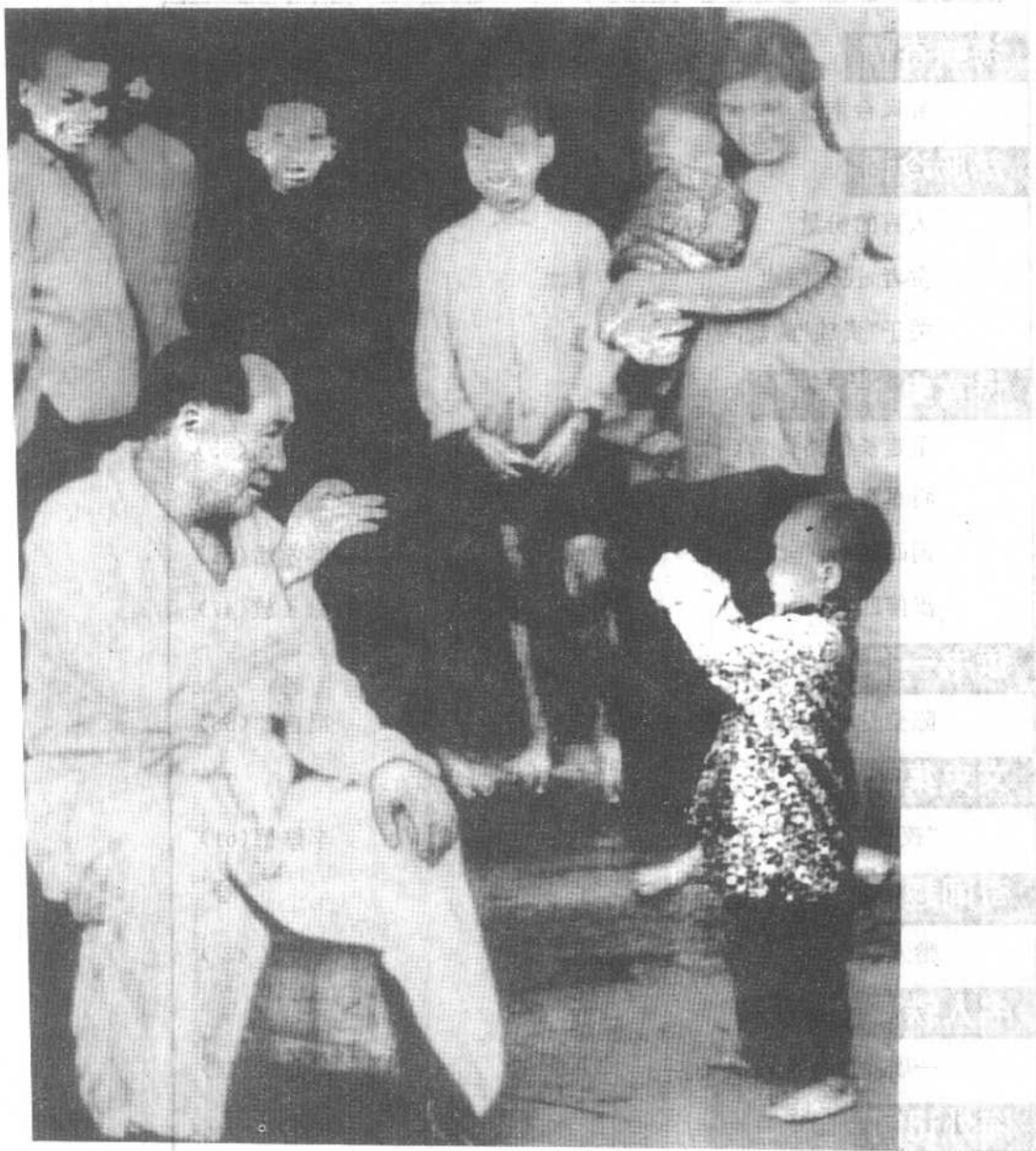
扬志才(50)

长寿之王像

(摄影)

周浩荣(封面)

毛泽东警卫



我叫柏灵，原名雷启文，贵州省瓮安县城人，现为武警新疆边防总队退休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今年9月18日届满90周年的瓮安县雍阳小学读过三年书，没毕业就参了军。1955年春，我由公安二师调到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一中队，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了三年的警卫工作，这里讲述的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谈毛泽东游泳

渤海击浪 北戴河。美丽的渤海有时也会发怒。一天，风并不太大，海浪却咆哮如雷。蔚蓝色的大海突然巨浪滔滔，两三尺高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席卷而来，直扑海岸一二十米远。平时喧哗的海滨，这天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这时，毛主席要下海游泳。我们四个队员，加上中队长韩勤余，五个人陪同主席下海，主席走在前头，中队长在他身后，我们四个分别在左右，大家一齐向海里走去。

刚走了十几米远，一个大浪卷来，把我们几个全都掀倒推上岸边好几米远。我们担心主席的安全，忙翻爬起来扶他。幸好，当大浪扑来时，韩中队长在主席身后，一把将主席抱得紧紧的。韩队长的背和手肘、手腕都擦伤了，但是主席安然无恙。

主席站稳后，很风趣地说：“哟，还厉害得很哩！”他左手叉腰，右手往海里一挥，说：“再下去！”

这次我们有了经验，加强了对主席的保护，用3个人在他身后，留两个在他左右，然后，大家手挽着手，一起向大海走去。

刚走了几步，又是一个大浪扑来。我们退了两步，但没有被推倒。我们扶着主席继续前进。一个又一个大浪冲来，我们照样顶住了。很快，我们离开了岸边，游向大海深处。

长期在大海中游泳，我们已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果起伏式的小浪来了，我们一抬头，胸一挺就过去了；大浪，又叫卷花浪，是从头上卷下来的，遇到它就不能抬头挺胸了，而要往水里钻，浪一过又从水里钻出来。这样，再大的浪我们也不怕。

主席领着我们一直向深海游去，游过了防鲨网（海滨游泳场边专门防止鲨鱼伤人的设施）。这时队员郑文对主席说：“主席，我们已经游到防鲨网外了，再向外就危险了。”

主席问：“防鲨网在哪里呀？”

郑文回答：“就在脚下。”

主席潜水下去摸了两回，但是没有摸到，然后开玩笑说：“不要紧，鲨鱼来了你们就打它嘛！”主席的话把我们都逗笑了。

主席的游泳技术十分高超，用句话来形容，可以说他在水里如履平地。他可以用各种姿势游泳：有时自由式，有时蛙式，有时侧式或仰式，常用的是自由式和侧式。在水中，他可以坚持几个小时；在流水中，他可以逆水前进，也可以躺在水面一动不动，随水漂流。我见过不少高级领导人游泳，能长期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的，除了主席和当时的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两人外，我还没有见到第三个人。

桔子洲头 1956年5月30日，天蒙蒙亮，毛主席就从广州白云机场登上飞机，前往长沙。9时许，飞机在长沙机场徐徐降落，主席下飞机后，乘车向长沙驶去。很快，我们来到了湘江边。湖南的同志知道主席爱游泳，他们在江边准备了几艘快艇和木船。主席登上快艇后，马达轰鸣，三艘快艇一齐起航。

5月的湖南，鲜花竞开，雨后的湘江，春潮暴涨，洪水滔滔。快艇刚到江心，卫士长李银桥从船仓里出来说主席准备下江游泳，让我们作好准备。我们立即换了衣服，将武器衣物放在快艇上，留一名同志看守。

当天陪同主席游泳的，除了我们一中队的五个人外，还有当地保卫部门挑选的一些同志。主席在江中顺水往下游，过了一个小时，也不知游了多远。那时水温相当低，一些年轻人都支持不住了，只好爬上木船休息。汪东兴同志很着急，忙对主席说：“主席，已经一个小时了，上来休息一下。”

主席抬头看到，远处有个小黑点，就把右手向那黑点一挥说：“我们游过去。”我们几个只好跟随他继续向下游。

那个黑点越来越大。不一会，我们认出那是江中的一个孤岛，名叫水茱洲，又叫桔子洲。主席说他在长沙上学时就常来这里游玩。岛越来

越近了,可以看出,岛上大约有几十户人家,有农田,也有果木。地里种的大都是蔬菜。岛的四周多种着护堤柳树,也有其他小一些的树木。这些树大都被拦腰砍断,是为防止长高,以免被大风连根刮倒。当时江水暴涨,不少树桩都淹没在水中,只露出一些小枝条在水面上飘摇。

我们很快游到了岛边,主席想乘木船上岛。由于这里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小木船无法停下来。主席两手抓着晃动的船舷,试图爬上船去,但因为体胖,此时臂力又不够,所以尽管船上的使劲拉,水里的也用力推,可怎么也上不去。周围的流水声哗哗直响,说话又听不见,船上的人使劲拽住他的手不敢松开。

主席见上不去,就对船上拽住他手的人大声喊道:“快放开,快放开!”船上的人这才松开了手。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主席碰在树桩上,几个人尽量向他身边靠拢,但水流太急,无济于事。

确实,打铁要靠自身腰板硬。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主席顺手抓住一根柳枝,奋力搏击过去,终于爬上了岸边,我们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才平静了下去。

小岛上没有码头,快艇无法靠岸。主席和我们的衣物都在快艇上拿不到。幸好卫士长拿了一件雨衣和一双拖鞋放在小木船上,要不然,主席上岸后就只有光脚丫子走路了。

主席披上雨衣穿上拖鞋,就向在地里干活的社员走去。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不要说武器和警械,就连遮体的衣服都没有,只好穿着裤叉,光着背,赤着脚,紧跟在他身后。好在那时的社会治安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大家心里还是踏实的。

有几个农民在地里收菜、翻土,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一些青年游水玩哩。等走近了,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场的农民一时高兴得不知所措,纷纷邀请主席到家里去。有一位姓周的家较近,主席就来到了他家。

主席建议在院子里休息,于是主人拿来了长凳,又取来了旱烟和茶水。岛上的农民奔走相告,不一会儿,就有几十个人紧紧地围在主席身边。主席坐在凳子上,边抽旱烟边喝茶边和农民们拉家常,征求他们对政府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办夜校的情况。他用他那道地的湖南话和农民们交谈着,越谈越有兴致,还不

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他周围挤满了人,有的人手里还捏着镰刀、锄头等农具,那些小孩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劲直往人圈里钻。我们这些警卫人员手无寸铁,出于职业习惯,心里有些不安,考虑到一旦有了不测,只好用自己的身躯去保护领袖了。

主席谈了一阵,抽完旱烟,又喝了一大碗凉茶,然后站起来说:“我要走啦,以后来看望你们。”说完,他和社会员们一个个握手告别。有的社员,尤其是妇女和老人,热泪不断地往下流;男社员们则激动地喊着口号送行。主席上了木船,还不停地向送行的群众挥手致意。

1957年9月9日是中秋节。主席在武汉视察工作后,又一次来到了长沙。那天长沙天空晴朗,他决定在这个佳节里再去看望桔子洲的群众。

下午5点多钟,我们跟随主席乘轮船到了桔子洲附近的江面上。这时的湘江,与去年5月份完全相反。由于干旱,江水大大回落,江两岸的河床上糊了好几十米宽的淤泥,最深处达到六七十厘米。没有码头,大船靠不了岸,主席决定仍由江中游过去。江水中好游,淤泥地难行,要通过那么宽的淤泥地带是困难的。好多人都劝主席改日再去,但他坚持要去。我们知道,凡是他坚持要办的事,是没有办法阻拦的,我们只好跟随他一块去。

主席刚一离开水面站起来,两只脚就陷入了淤泥中,一时拔不出来。我们四五个人立即上前去扶他,刚帮他拨出一只脚,但另一只脚又陷进去了。他每迈出一步,我们都要帮他拔两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越过了这几十米宽的淤泥地带。上岸后,主席从大腿到脚背被淤泥糊住了,我忙从吊井里打来一桶水,给他冲洗干净。没有其他衣服穿,他只是披上雨衣,穿上拖鞋,又到群众中去了。

那天人很多。主席到了较近的一户农民家里,主人照样搬来凳子,拿来了旱烟,端来凉茶。主人由于心情激动手忙脚乱,倒茶的碗也没有洗干净,碗边还有大米饭粒。我们见了心里好不是滋味,主席却毫不在意,端起碗来一饮而尽,还直夸这凉茶好香。

主席向在场的农民们祝贺佳节,跟他们无拘束地攀谈了好一阵,然后向大家挥手告别。群众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到江边。

驰骋华北平原的

骑兵团

●
晓
珊

人们可曾记得，五十年代上映了一部苏联电影，名叫《夏伯阳》，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最近，北京电影制片厂电视部组织贵州的作者，根据贵州冀鲁豫党史组编印的《铁骑战歌》，编写成剧本，准备拍摄一部类似哥萨克骑兵团的电视连续剧，初定为20集，取名《白马团传奇》。这部电视连续剧，取材于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反映抗日战争英勇、壮烈的场面。不过，对于片名，讨论时颇有争议。任过骑兵团政委的李庭桂同志（原贵州省委副书记）介绍，这个骑兵团并不都是白马，4个连队以马的颜色区分，一连是黑马、二连是红马、三连是白马、四连是杂色马。老百姓不知内情，当白马连出击时，人们说“白马团来了”；当黑马、红马连出击时，人们又说：“黑马团、红马团来了”。所以群众就把骑兵团习惯称为“白马团黑马团”。

早在1936年，彭德怀将军任西征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以红一军团为左翼，红十军团为右翼，粉碎了马鸿宾、马鸿逵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围剿”，消灭了“二马”的3个骑兵团和两个保安团，得了一批枪支和700多匹战马。为了提高军团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军团首长决定以手枪连和骑兵团为基础，建立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建团不久，便配合红一师、红七十三师，在宁夏固原县黑城镇，击溃了贸然进攻的东北军骑兵团第六师，首战告捷。为了迎接朱总司令及二、四方面军北上，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命令骑兵团日夜兼程300里，奔袭甘肃会宁城，一、二、四连主攻北门，三连攻打西门，500铁骑兵出其不意，一举突入城内，歼灭甘肃保安团一个营和会宁县一个保安中队，保证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联手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的一部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原红十五军团骑兵团调归一二九师指挥。1937年9月下旬，骑兵团从甘肃镇源县驿马关出发，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在昔阳四十亩地村第一次与日军交锋，歼敌100余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

1937年10月，日军沿津浦、平汉铁路长驱直入，连占德州、石家庄、邢台、邯郸，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人民死伤不计其数。刘伯承师长命令骑兵团，翻越太行山，向冀西挺进，直逼平汉路。临行之际，刘师长紧握着夏云飞团长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要游要击”。

11月底，北方已是寒冬天气，30日下午，日军200多人，乘坐18辆汽车，气势汹汹地从高邑县向赞皇县北马村方向杀奔而来，意在解除骑兵团对平汉铁路的威胁。夏团长对日军的这次行动早已作好精心安排，派四连前去阻击，用地雷炸翻日军先头汽车，然后且战且退，延至黄昏时分，把日军诱入北

马村宿营。夜幕降临，原野一片沉寂，日军经半天战斗疲惫不堪。骑兵团早已整装待发的一、二、三连，骑着黑马、红马、白马、趁着漆黑的夜晚，迎着呼啸的寒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来到北马村。三连的突击队首先砍死了日本哨兵，二连接着放火焚烧日本军车，烈火趁着大风愈烧愈旺，停车场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日军困兽犹斗，以十倍的疯狂向一、二连反扑，战斗十分激烈。骑兵团战士挺身跃马，挥动大刀向敌群左劈右砍。经过一夜激战，终于消灭了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的日军140余人，18辆汽车全部烧毁，成功地取得了北马村诱敌深入歼灭战的胜利，打破了日本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增强了抗日军民的信心。

北马村重创日军之后，骑兵团东越平汉路，进入冀中，先后攻克宁晋、晋县、束鹿三座县城，歼伪军300余人，接着又于冀城县塔元庄伏击歼灭日军一个小队，进一步打开了冀中抗战的大好局面。

1938年春，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亲自率领骑兵团进军冀南平原，由临城县黄腊沟出发，经过巨鹿到达南宫县，与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会合，一举攻下任县、平乡，乘胜夺取南和、曲周县城，打垮了大汉奸李耀庭操纵的“六离会”，扩大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这年的7月间，骑兵团正在肥乡、成安、临漳、魏县等地活动，忽然得到情报，有日军100余人，押运48辆汽车，从邯郸到大名运输军用物资，估计两天后经成安县东的漳河店返回邯郸。当时王振祥团长率一、四连在临清执行任务，邓永耀政委和梁俊亭副团长当机立断，命二连、三连和新兵营在漳河店进行伏击。侦察参谋前往查看地形，见公路是东西走向，村西是一片丛林，村北有一座沙岗，村东绿油油的庄稼为天然青纱帐，正是我军埋伏的好地方。到第三天拂晓，二、三连接时到达伏击位置，人和马都静悄悄地隐蔽在青纱帐中，大家屏声静气等候着日军的到来。不久就听到由远而近响起了隆隆的汽车马达声。日本军官站在车上，四处张望，他似乎发觉情况有些异常，下令所有汽车鸣喇叭，开足马力向西飞驰。三连唯恐放过了日军，立即投出一排排手榴弹，紧接着用机枪扫

射、步枪射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趁着敌人慌乱之时，战士们纷纷跃上马背冲入敌群，砍死砍伤，打死打伤敌军130余人，击毁军车27辆。东方发白，战斗胜利结束，战士们骑着战马，兴高采烈地迎着太阳撤离了战场。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暂停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逐渐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当年11月至翌年3月，日军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1939年1月中旬，日军分11路向我冀南中心区合击，一二九师在刘邓指挥下，打退日军大小百余次进攻。2月10日，由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项城固战斗，歼灭日军200余人，俘虏日军8人，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我首脑机关的图谋。

从1941年开始，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日本侵略军为了把华北变成“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封锁，妄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炮楼造成一个“囚笼”，困死我军。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组织了一系列的反蚕食、反封锁的战斗。1942年4月上旬，骑兵团决定智取武官寨据点。团首长命令两个连的指战员，化装成老百姓，有推车的、挑担的，熙熙攘攘到武官寨“赶集”，在据点门外摆摊设点，高声叫卖。又叫两个战士装成伪军，伺机击毙哨兵后，就见曾玉良团长带领“赶集”的人蜂拥而进，烧毁了敌人碉堡，然后一阵快马，一溜尘土，队伍离开了武官寨。

4月29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亲自指挥，对我冀南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其规模之大，空前未有。日军出动了一个师团，三个旅团连同伪军共3万人，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一大早，敌人即从四面八方向我冀南领导机关驻地开来，汽车、坦克、部队，渐渐合围拢来，形成一个包围圈。飞机在包围圈上空盘旋、扫射，形势十分危急。骑兵团为掩护冀南区机关，放弃了乘敌合围圈还未形成之机突围的打算，与机关大队人马一起突围。在武城县王行杖村遭到日军火力封锁，一连下马对峙，敌强我弱，情况于我非常不利。四连长趁日军机枪手

將軍懷念將軍

● 遯 公

北京友人寄来黄克诚将军《江城子·战友》一词，注云：1965—1966年岁末年初于山西。时黄克诚同志被下放山西，彭德怀同志被下放西南。黄想起横遭冤屈的老战友，无限感伤。遥望西南，赋成此阙。但一直深藏心中，直到1981年才口诵出来。时彭已含冤逝世七年。词云：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共怀都一样，太行顶，峨嵋岗。往常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奔走呼号，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忆伤。

这首词沉雄而宛转，读之情感肺腑。可作史诗视之。《贵州文史天地》有“诗情画意”一栏，今后，希望少见或不见无谓唱酬和妆点风景之作，当以黄将军《江城子》为示范如何？

换梭子的一瞬间，率领全连象箭一般猛扑过去，大刀砍倒敌人，冲开一个缺口。突至大辛庄时，队伍与日军骑兵相遇，骑兵团迅速抢占一条路沟，架起12挺机枪向日军扫射，打得敌兵人仰马翻，突破了日军第二层合围圈。黄昏时，骑兵团掩护区机关等突围队伍，绕过村镇，踏过荒野河沟，继续向南宫县方向行进，冲出了第三层合围圈，最后在枣强县西南的瓦窑一带，经过一夜激战，终于使日军蓄谋已久的“铁壁合围”战术变成了泡影。

此后，骑兵团又连续进行了元城(县)、回隆(镇)、临漳(县)等战役的战斗，歼日伪军1000余人。

1942年12月，骑兵团奉命开赴冀鲁豫边区战场。在西至太行山，东至泰山，北至卫河，南跨陇海路，2000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骑兵团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在3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大、小索庄、郭小寨、双村营、插花楼、姜庄、楚旺镇等无数次战斗，歼敌上万人，并且严惩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勾结日伪、袭击八路军的顽固军队，为坚持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迎来了对日军的全面大反攻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一二九师骑兵团挺进冀西，征战冀中，浴血冀南，转战冀鲁豫，纵横驰骋在

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了它行动快速、机动、灵活的优势，真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来如闪电，去似流星，铁骑所至，敌人闻风丧胆。8年抗战中，留下了一桩桩，一幕幕惊心动魄神话般的动人故事，声名威震华北。

1945年2月，中共平原分局授予骑兵团“哥萨克骑兵”锦旗一面；冀鲁豫行署授“胜利冠军”、冀鲁豫军区授“艺高胆大”，三面鲜红的锦旗，凝结着许多骑兵勇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献出的鲜血和生命，鼓舞着英勇的骑兵团，他们高唱《铁骑战歌》，驰向新的战场。

快快地跨上战马举起战刀，

怀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穿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到最前线，

侦察警戒处处留神驰骋在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英勇无敌我们的铁骑兵。

在1946年开始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骑兵团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参加了邯郸、定陶、鲁西南、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等十多个大战役，纵马挥刀，战功卓著。1949年，骑兵团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的一个作战军队，南下江西，西进贵州，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团政委李庭桂同志留贵州转地方工作，直至今日。

怀 念

沙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了，他是1992年12月4日在成都病逝的。最近我整理“文化大革命”后文艺界一些新旧朋友赠送我的图书，发现了沙汀的赠书比其他作家都多。从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选》起，《沙汀选集》（四册）《沙汀文集》（七册）《出了牛棚之后》（包括《青枫坡》《木鱼山》《红石滩》三个中篇小说），还有这三篇的单行本以及《睢水十年》，这位以写四川西北地区农村、乡镇而著名的老作家，可谓著作等身。赠书之多表示了他殷殷的情谊，愈增我对他的怀念。

我和沙汀相见恨晚。三十年代，抗日战争之前，他长期旅居上海。而我又久住北京，根本没有机会见面。但是我读过他和艾芜联名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对方的回信，（发表在1932年初的《十字街头》）后来鲁迅把它们收入了《二心集》，标题为《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回信中的两句名言“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直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学写小说的人的准绳。不久我就读了沙汀《法律外的航线》，手法独特，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获得了茅盾同志的好评。

抗日战争最后两年，我在贵阳主编《贵州日报》的《新垒副刊》，来稿不多，我只好写信到集中在四川的相识和闻名的作家们求援。有人告

诉了我沙汀的住址，我也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很快就寄来了一个短篇《范老师》，我觉得写得不错，为我们的副刊大大增色。没有等到发稿，我马上就汇去了微薄的稿酬。那时他给党做了不少工作，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躲在安县睢水乡，一面深入生活。他的家累很重，生活相当困难，收入一点稿费，也许不无小补。《范老师》后来虽然收入了一个集子，他在后记中还是不满，觉得“只表示了人民的和平运动，没有强有力的行动”。

建国初期，在西南局的领导下，重庆先后成立了西南文联和作协重庆分会，邀我参加，我很荣幸地在那里会见了闻名已久的沙汀和其他许多成绩卓越的作家，欢聚一堂，不胜愉快。每次开会，我总要在重庆逗留几天，晚上沙汀喜欢约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劫人一起去喝酒、宵夜，我也往往被邀，因为我没有这个嗜好，盛情难却，只去过一次，他们谈笑风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沙汀后来回到北京，担任了重要工作，在开会时我们又能相聚，有时我还到木樨地他住的那座小楼去访问他，高谈阔论一番。我们的通信一直没有间断过，他的来信总是热情洋溢。

沙汀最使我佩服的是他肯大力培养新人，不仅在四川扶持了罗广斌、杨益言、克非、高缨、

沙汀

周克芹一批写作勤奋的作家(高缨最近在《新文学史料》发表沙汀的十二封信的前言,就推崇沙汀是他追随多年的严师),而且对我省的石果也予以鼓励、支持,读了石果在《西南文艺》初露头角的短篇《喜期》之后,他的明眼便看出这位作者是个人才,来信要我向领导反映,把他调到省文联写作。石果列席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也出于沙汀的推荐。时值石果的代表作《风波》以头条位置在《人民文学》上刊登,立即引起了许多与会代表的注目与赞扬。不久《人民文学》又转载了《喜期》。据我所知,沙汀长期都关心着石果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石果惨淡经营,历时二、三十年才完成的长篇《沧桑曲》,这篇巨著写了两位妇女在党培养下的成长过程,当时青年们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英勇表现,又写了大跃进时期“左”风骤起之下各种人物不同的命运,长达一百多万字。从联系出版社和出版,直到评论,沙汀都十分关怀。我认为这是继承和发扬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作风。

1982年石果先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喜风集》,最初决定请沙汀写这本书的序言,他却给我来信说:“你是石果的同乡,而且又同事多年,你才是作序的适当人选,最好是你写。其实沙汀的鉴赏水平大大超过了我,这完全出于他的谦虚。如果由他来写,肯定会写出一篇好文章。

但是集子付印在即,我只好勉为其难,遵命办理。

1958年秋天,沙汀偕同艾芜、林斤澜、刘真第一次来贵州访问,省文联还召开了座谈会,可惜我当时在乡下,没有赶回来。如果我在场,肯定要问这位来自天府之国的作家,到了崇山峻岭的贵州(虽然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讲真话,有些什么观感。以后在北京和他多次晤面,也忘记了问他。

沙汀的两篇杰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和《一个秋天的晚上》听说不久前已经拍成了电视,前者揭露了抗战期间四川兵役的黑幕;后者写了一个妇女堕落为娼的不幸的遭遇,却得到基层人民的同情。这也是沙汀自己喜爱的短篇之一。记不清楚他在哪篇文章中说过:“故事虽说有些阴暗,却使人感到并不会绝望,而是对于生活的依赖(大意)。我们对它们通过电视和广大观众接触都为之高兴。

我与沙汀结交四十多年,我觉得这位巨匠的长处很多:为人真诚,富于感情,有时也容易激动(有一位小说史家说过,这正是他的性情刚直的表现)。沙汀的小说善于讽刺与暴露,而且善于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刻画乡镇人物的性格。川味十足,使人阅读时宛如身临其境。他对小说主张少而精,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为严格,经常虚心听取评论家和读者的意见,不断修改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他的集子的后记或杂文中往往可以看到他的虚怀若谷的表现,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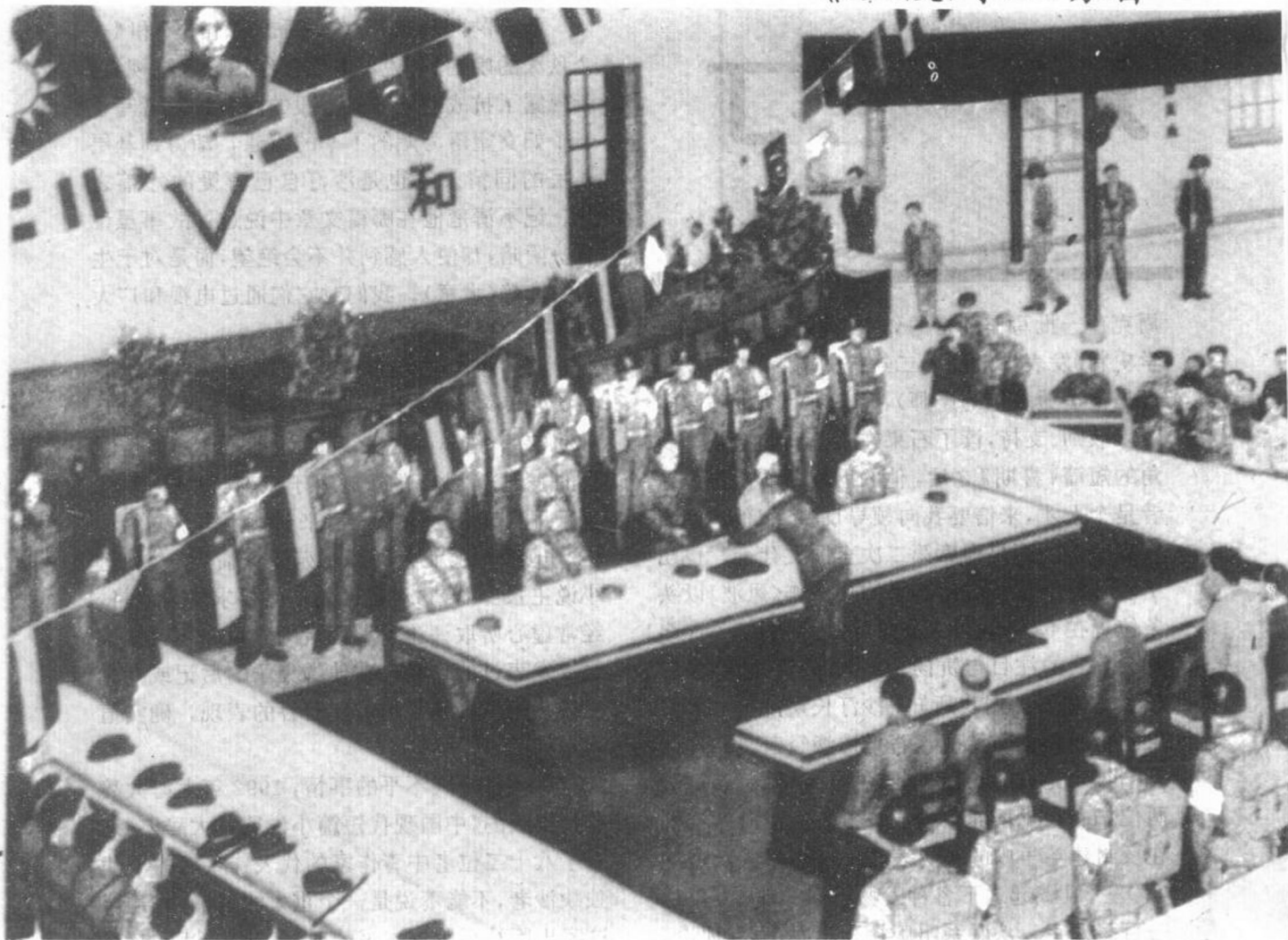
有一件令人不平的事情,1992年上海大辞典社出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欣赏大辞典》选评了八十二位老中青作家的代表作,老的一代独缺沙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漏。我建议这家出版社再版这本书的时候,补入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或者其他公认的短篇杰作。我不理解,为什么主编人和撰稿人居然把这位讽刺艺术取得卓越成就的名家忘记了呢?

为了追怀逝者,我决定重读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和某些短篇代表作,以便继续向他更好地学习。

1994年6月13日

一篇下

——《从敌对立场看



在中国，一篇只有三个人看过的绝密文章所造成的历史之谜，已经隐藏了半个世纪。写作者和阅读者均已先后作古，而文章的内容仅仅透露了些蛛丝马迹，下落却不得而知。这个谜不知是否还有解开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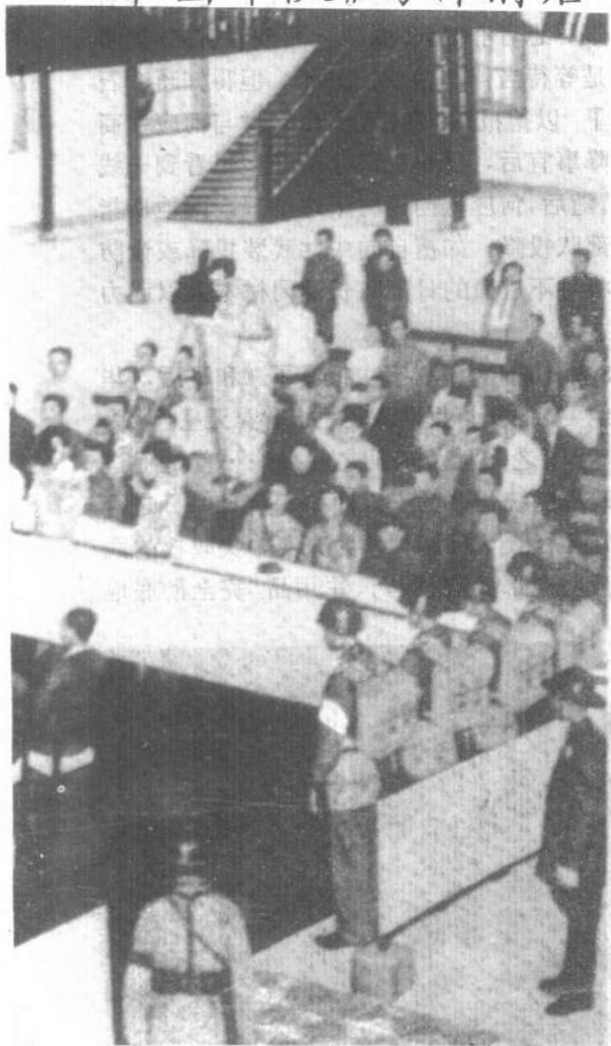
这篇文章，产生于1946年。当时在中国战区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在处理日军投降事宜的过程中，以私人名义秘密地要求侵华

日军头号战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写的。

说到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的关系，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奇妙无比的冤家对头”。冈村是日本军界的“中国通”，自1915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即作为参谋本部部员赴中国，在“青岛围攻军”司令部任职。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1年间，先后任日本驻北京领事馆青木顾

落不明的绝密文章

《中国军队》写作前后



问的助手、日本驻上海武官、孙传芳的顾问、又作为日本政务次官的随员视察过山东。“济南事变”发生时，升步兵大佐，率第六联队驻军青岛。后回国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主编《济南事变出兵史》并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升少将，主持日本陆军现代化研究。先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旋即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3年，他作为关东军的首席代表，

与何应钦签订了《塘沽协定》，随后又就国民政府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在长城设卡收税诸问题，在北平经常与何应钦打交道。冈村对何应钦的第一印象是“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而何应钦对冈村的第一印象更妙：冈村“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和我们很像是同志”。当时的中日双方实际上是处于交战态势，但何应钦与冈村见面时畅谈甚欢，并赤裸裸地摊出了国民政府的底牌：“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这句“名言”，在侵华日军将领中广为流传，战后被冈村宁次称为“何应钦预言”。1935年11月，冈村升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途径南京，正值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冈村不敢与中国当局接触，只好到日本领事馆找须弥磨吉郎解决食宿。身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得知冈村到南京，便从家中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邀请冈村到他的公馆吃晚饭，并且相约，只叙友情，不作任何有涉政治的谈话，冈村深受感动，欣然赴宴。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后又兼参谋总长，从对日谈判的第一线退到对日抗战的大后方。而冈村宁次则调任仙台师团任师团长，到侵华第一线去屠杀中国人民。冈村后升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曾多次指挥对陪都重庆连续实施“神经轰炸”，企

图摧毁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战后，当他得知何应钦居住的地方也被重磅炸弹炸中两三次时，便对何说：“如果您在公馆屋顶上作一个记号并让我知道，我可以叫他们不炸您。”

1944年11月，冈村由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晋升为大将。稍后，何应钦调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两人旗鼓相当。冈村上任伊始，在桂柳作战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标后，放纵其部属掉头北攻贵州，前锋越过独山，直抵都匀姬家桥，因后援和补给不济，才主动后撤。而何应钦对这位老朋友的战略意图并不了解，以为日军真要进攻贵阳，直捣重庆，威胁昆明，连夜由重庆赶到贵阳督战。岂知这是冈村试验以驮马进攻的机动性能，作为“出击四川”的尝试。日军在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的追击下，退回广西，何应钦指挥退敌取得了喧腾一时的“黔南大捷”。

1945年8月10日，何应钦指挥反攻桂柳得手。设在南宁的前进指挥所从无线电监听中得知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初时将信将疑，及至收到蒋介石的“未灰亥令一享电”，才相信日本投降指日可待。于是，一个依靠冈村宁次“联日反共，垄断受降”的酝酿多时的计划开

始付诸实施。

历史有时似乎是由人精心安排的。8月15日，在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无条件投降诏书前一个小时，蒋介石步行穿过夹道欢呼胜利的人群，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广播演说》，这便是史称“以德报怨”的宣言，强调人道，对日军“不念旧恶”“禁止施以报复”，“与人为善”。初听到日皇的投降诏书时，冈村总部沉浸在一片悲恸而愤怒之中，嚷着要剖腹尽忠者有之，主张拼一死战者有之，更多人则是等待当俘虏甚或被处死。但得知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宣言，又令冈村与何应钦商洽投降事宜后，日军总部才从绝望里看到一线生机。随后，何应钦向冈村下达了只准向他所指定的部队投降，如擅自向中共武装投降或让防者，将对不遵命的日部队长及冈村本人以武力制裁之。

8月18日，冈村宁次拟具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的扶蒋反共意见书，呈奏天皇，认为“将来帝国之飞跃及东亚之复兴……首是促进中央政权的统一”“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应将全部武器、弹药、军用品“完全彻底地

